

# 我的“笔耕五项”

Some Notes on My “Writing Pentathlon”

侯幼彬 | HOU Youbin

中图分类号: TU-0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1-0108-09 DOI: 10.12285/jzs.20240131002

什么是“笔耕五项”?这是我套用体育界“田径五项”“冬季五项”“现代五项”等“五项”的用语,把我的写作也分成五个门类,称之为“笔耕五项”。

我的这个“笔耕五项”涉及5个领域:

- 一是“中国建筑史学”;
- 二是“建筑理论读解”;
- 三是“中建史讲稿”;
- 四是“中国近代建筑”;
- 五是“建筑小品和普及读物”。

下面分别展述。

## 一、中国建筑史学

中国建筑史学是我写作的主体,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退休前围绕着“中国建筑美学”这个科研方向的写作;后期是退休后围绕“中国建筑之道”的写作。

1950年代,国内正处于“美学热”阶段,热火朝天地展开美学大讨论。这个时候,建筑界也在开展建筑风格、建筑艺术的大辩论。我意识到,建筑艺术涉及的问题,建筑理论争议的问题,正是美学范畴的事。我们要想提高建筑理论,出路正在这里。因此我对这场美学讨论大感兴趣,成了高痴迷度的美学发烧友,像是加入了编外的美学进修班,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教研室很支持我,同意我不去外校建筑系进修,就以这种方

式系统地自学美学。这样,我用“美学”这块敲门砖去叩“建筑理论”的门,仿佛在建筑理论上、建筑史学思维上、建筑艺术认知上都开了一点儿窍。现在知道,这实质上是一种“跨界”学习,我不经意地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的确改变了我的知识构成。

我从“美学”接触到“软科学”,有了“软”的意识和“软”的视野,我的中建史教学和科研相应地有了哲理的底气。“中建史”遇上“美学”,在我这里自然融合成“中国建筑美学”,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我的科研方向。我围绕“中国建筑美学”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提出了建筑“硬传统、软传统”的概念,写了一组关于建筑“软传统”的论文;二是我指导的研究生,分别以传统建筑的单体、庭院、组群、屋顶、台基、装修等为选题,撰写了11部研究传统建筑构成形态和审美意匠的学位论文;三是以“中国建筑美学”为题,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出版了《中国建筑美学》专著。

我这本《中国建筑美学》展述的是中国建筑“软传统”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低阶的“形态”层面——阐释中国建筑形态与审美意匠;二是中阶的“创作精神”层面——探讨中国建筑的“伦理”理性与“物理”理性;三是试图探索中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美学问题——建筑意境,论析了意境的“召唤结构”和“鉴赏指引”。

作者:  
侯幼彬,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录用日期:2023-05

书很顺利地写成了，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出版？那时候，要出这种理论性的、销量可能成问题的书，出版社还是很犹豫的。正当我还落实不了出版社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途径，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曲家东社长得知我的书稿信息，主动找我，说可以由他来出。我不认识曲家东先生，我很感谢曲先生的信任，也很佩服他敢于拍板出版这种理论书的魄力。后来我和他成了很熟的朋友，他对我说，他对自己的这个决策很有些自我欣赏，能由“黑科”出版《中国建筑美学》是他做的一件很得意的事。

《中国建筑美学》出版后，在不同场合、不同年度获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这些我并不很在意。忘了从第多少次印刷开始，封面上添加了“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一行文字。我知道有了这一行文字就算是正式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了，但是对这事我也没太在意。我这时候心里牵挂的是这本理论性的书，不知道前辈大师能不能认可，同行专家能不能认同。这方面的局面还好。赶巧在这个时候，吴良镛先生正关注中国建筑的理论研究。他在为萧默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所写的“序”中，谈到中国建筑的研究在达到一定的广度之后，需要逐步地、更为自觉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研究阶段。他说这个阶段迫切需要的就是努力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进一步上升到较为系统的理论高度。他指出：

“可庆幸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已不是没有人在做，例如，傅熹年对中国建筑和组群构图规律的研究，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侯幼彬的《中国建筑美学》、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和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萧默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都是注重理论并采取史论结合写法的比较重要的成果。”

有了吴先生的这句话，对于这本书的理论认可问题，我就吃了“定心丸”。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跟《中国建筑美学》相关联，还冒出过几件感人的轶事。下面我简述三件，聊表我的感激和深深的

感谢。

第一件是汪坦先生的“破格推荐”。那是1988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汪坦先生安排他自己以及刘先觉先生和我，各为黄石市建委做一场学术报告。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对口的近代建筑专题可讲，只好把手边刚完成的一个理论专题——《建筑的“软传统”和“软继承”》——拿来应付。这时候《中国建筑美学》还没有成书，“软传统”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思路。我很想借这机会听听汪先生对这个基本思路的看法和指点。没有想到的是，汪先生在听了我的学术报告后，并没有给我什么评价，却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他说：

“这个题目很值得给建筑系师生讲，明天请你给华中工学院的师生讲一下吧。”

原来华中工学院趁汪先生来武汉开会的机会，邀请汪先生做系列讲座，明天就开始讲座的第一讲。汪先生知道我后天就离开武汉、回哈尔滨，他临时决定，把他的第一讲往后延，让我插进来讲“建筑软传统”。这件事实在让我太感动，深深感受到汪先生对于推动学术活动的真切关怀和极度热情，以至于毫不介意地推延自己的讲座，这是何等的博大襟怀，何等的坦荡心胸！我想汪先生能够这样破格地推荐我去华中工学院讲“软传统”，自然意味着对这个基本研究思路的认可，这一点也让我很高兴，让我对《中国建筑美学》的研究方向和基本思路更坚定了信心。

第二件是老友萧默的“抱病评议”。《中国建筑美学》出版后，跟着就有“麻烦”的事——出版社和科研处都让我请人写“书评”。因为对科研成果的评定，得看能评到什么奖。为了能评到大奖，最好得有些有分量的人写有分量的书评。

这件事可苦了我。我实在抹不开情面请人写书评。想来想去，我请了一位既是清华校友，也是同行老友萧默。他这时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出版过《敦煌建筑研究》名著，他主编的大部头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即将出版，由他写书评当然够分量。萧默老友很

快给我回了一封信，密密麻麻地用电脑打字写了整整三大页。他对这本书很是赞扬了一番，很兴奋、也很高兴答应一定给我从“读后记”的角度写书评。只是这时候，他手边正忙着拍一部20集的《中国建筑艺术》电视纪录片。他说等忙过这事，就给我写。

到了1998年3月，我收到他写的一封短短的信，说他生病了，已经住院一个多月，医生要他停下一切工作。他告诉我，住院期间，已全部细读了我的书，可惜他现在不能写了，等病好些时一定写。在这封信的后尾，萧默兄的夫人特地又附上几句，说医生特别强调手头的工作一定要完全放下，再不能带病坚持了，所以书评的事怕是不能完成了。

我接到这信大吃一惊，我没想到萧默兄生病了，而且是大病。后来听说他做了肾移植手术。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住院，身体状况和病人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居然还细细地看我的书，想书评的事。我为这感到非常内疚，赶紧写信过去请他专心治病，千万不要再考虑书评。哪知道，萧默兄还是抱病把书评写了。我对于萧默兄在重病期间插手为我写书评的事，非常非常地歉疚，也非常非常地铭感。不知是什么缘故，这篇凝结着深情厚意的书评，一直到2000年10月才在《建筑史论文集》第13集发表。读者不会知道这背后有这样感人的故事，而我在读这篇书评时是忍不住满眶泪水的。如今，萧默老友和夫人都已过世了，我谨在这里致以深深的悼念。

第三件是陈志华先生的“随笔专论”。《中国建筑美学》的出版，带给我的最大惊喜就是陈志华先生专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学术随笔。我特喜欢志华先生的文笔，喜欢他的睿智，喜欢他的高视点，喜欢他的敏锐的觉察、犀利的针砭、洒脱的文风。他在《建筑师》上连载《北窗杂记》，每一期一则。我每次拿到新一期的《建筑师》，迫不及待地首先要读的一定是这一期里的《北窗杂记》新篇。1998年9月的一天，当我手捧《建筑师》第83期，照例迫不及待地先翻看这期刊登的《北窗杂记》。

我怎么也想不到，喜出望外地发现，这一期刊发的《北窗杂记》第六十四则，竟然是专为《中国建筑美学》写的。陈先生谈了很多，谈我们这一代人“学术晚成”的悲伤；谈《中国建筑美学》的“打阵地战”；谈这本书的“独到的见解、独到的史论结合的方法、独到的动态分析思路”。陈先生还特地强调这本书“没有玩云山雾罩的把戏，是一本严谨而实在的书”。我很高兴陈先生认同《中国建筑美学》是“实在的书”。因为我虽然热衷“软”思索，热衷写理论性的东西，但我和陈先生一样，非常厌烦那种云山雾罩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所谓的“理论”。我想，写“中国建筑美学”，要有哲理的深度、高度，但千万别成了故弄玄虚，也必须避免理论的晦涩，最好是把道理不显山露水地说得明明白白。我很担心这种理论性的东西会不会难以被专家和读者接受。有了陈先生的这一点肯定，我就放心了。

到2003年，我退休了，家也定居到北京了。我原本想退休后做两件事：一是和老伴一起去旅游；二是写一部多视角解读中国建筑的书。很快我就发现多视角解读的想法过于庞杂，宁可专而深，不要杂而浅，这样，我下决心就改为专写一部有关“老子论建筑”的书。

提起老子论建筑的事，说来话长，我刚进清华，就听说赖特曾经对梁思成先生说过“最好的空间理论在中国”的故事。赖特说的“最好的空间理论”，指的就是老子讲的“当其无，有室之用”那段话。忘了在什么场合，我还记得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有一位学建筑的博士，以《老子》的“当其无，有室之用”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sup>①</sup>。这两件事让我对老子这段名言肃然起敬，非常庆幸在《老子》这部世界哲学源头的书中，就有一段涉及建筑哲理的重要表述，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分外关注这件事。

《老子》关于“有室之用”的这段表述，出自《老子》第十一章，全章只有4句话，49个字：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实际上《老子》中有4章都涉及“有无”，其概念并不相同，让我莫衷一是。幸好老学学者陈鼓应把“有无”概念明确地区分为“现象界有无”与“非现象界有无”两类。我受此启发，把建筑划归“现象界有无”，这才一顺百顺把书稿写了出来<sup>[1]</sup>。

书稿篇幅还不小，加上配图有75万字。一共写了7章：

第一章的标题是：“《老子》论有、无”，是从建筑学人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哲理，作了自己的诠释和解读；

第二章的标题是：“建筑之道：‘有’与‘无’的辩证法”，是从“有无”哲理对“建筑本体论”的审视；

第三章的标题是：“建筑之美：植根‘有无’的艺术”，是从“有无”哲理，对“建筑艺术论”的审视；

第四章的标题是：“木构架建筑：单体层面‘有、无’”，是对中国建筑基本层面的“有无”论析；

第五章的标题是：“木构架建筑：其他层面‘有、无’”，是对中国建筑组群、建筑界面和建筑节点三个层面的“有无”论析；

第六章的标题是：“高台建筑：‘有’的极致”；第七章的标题是：“北京天坛：用‘无’范例”。这六、七两章分别用典型案例，分析中国建筑用“有”、用“无”的机制和手法。

我把书稿交给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王莉慧，她是我的研究生，她的爱人许东亮也是我的研究生。这是一对精彩的精英伉俪，他俩一直关注着这本书的写作。这时候，王莉慧是建工出版社一室的副主任，这本书就是由她担当责任编辑。她郑重地把这部书稿呈请资深编审王伯扬先生审稿。我得知是伯扬先生审稿，就知道这是能请到的最顶尖级的审稿了。据说伯扬先生很重视这部书稿，认真地、一字不落地理地审看。他的审稿评语说：

“（本书）在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与成就作了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就科学分析的层面而言可谓已趋于极致，把中国建筑辉煌成就的理论归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书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近年来建筑学领域内非常突出的一部佳作。书稿结构严谨，体例规范，文字顺畅，用词准确，鲜有失误。这样的文字水准，在梁、刘先哲之后，在建筑界似不多见，作者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我当时对于这部书稿的理论阐发，能不能得到学界和读者的认可、接受，还是不放心的，想不到伯扬先生给了这么明确的肯定。在我心目中，这是最权威、最有分量的肯定。有了这样的肯定，我对自己这本书的理论表达就可以放心了。这是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的。

这书送审时，书名是《中国建筑：‘有’与‘无’》。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有过一个神圣的命题，那就是6个字：中国建筑之道。但是我担心这书名太张扬、太高调，没敢用，就用了这个低调的书名。伯扬先生在评语里认为：

“书名《中国建筑：‘有’与‘无’》似觉欠妥。此名未能准确表达出书稿深邃的学术内涵，也难以使读者了然于胸。建议另起书名。”

书名确是个问题。书名未能表达书稿内涵，确是很大的失误。书名该怎么改呢？我反复地想，要不就大胆地用《中国建筑之道》吧。王莉慧也帮我想书名，她也觉得改用《中国建筑之道》这个书名可行。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触碰了三个“道”：第一个“道”是涉及所有“器物”的“有无之道”，我对老子的“有无”哲理作了认真的、有深度的诠释；第二个“道”是“建筑之道”，我从“有无”哲理的视角，对“建筑本体论”和“建筑艺术论”作了专题审视；第三个“道”是“中国建筑之道”，我对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各个层面的“有无”和用“有”、用“无”的机制展开了全面的诠释、阐发。对于“中国建筑之道”的研究，是本

书的主体；对于“建筑之道”的研究，是对“中国建筑之道”研究的铺垫；而对于“有无之道”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建筑之道”的基点。可以说这是一本名正言顺地研究“中国建筑之道”的书。由于有了王伯扬先生的审稿评语，我自己也有信心地认为这本书在研究“中国建筑之道”上是到位的。基于这样的分析，我终于鼓足勇气，毅然把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建筑之道》。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书名太好了，这是多么大气、多么响亮的书名呀。只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足以凸显老子的“有无”哲理是中国建筑之道的理论根基。我从建筑之道和中国建筑之道的阐发，更加意识到老子“有无”哲理的伟大。

## 二、建筑理论读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又掀起一股“方法论热”。这段时间，有关“老三论”和其他方法论的书，有关新方法与美学相交叉的书，有关方法论与各门学科交叉形成新的边缘学科的书，像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破土而出。我的整个感觉，就像是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这之前，对于建筑理论的探讨，我仅是基于“矛盾论”的哲理，受哈工大侯镇冰等各位先生撰写的“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启发，写了《建筑——空间与实体的对立统一》《建筑内容散论》之类的文章。方法论、交叉学科的热闹场景，实在让我惊喜，我觉得顿时从经典美学的视野一下子展扩到了现代方法学的视野，我从美学发烧友又黏上了方法论发烧友。我想尽量透过这些方法论的视角来审视建筑，把方法论与建筑理论挂钩，寻觅新的思路，阐释新的见解。我用刚刚学到的模糊学知识，写了一篇《建筑的模糊性》；从系统论的视角，写了一篇《系统建筑观初探》；借助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分析，写了一篇《建筑民族化的系统考察》；引入符号学的方法，写了一篇《传统建筑的符号品类和编码机制》；围绕跨学科的建筑美学，写了一篇《建筑美的形态》；按照文艺方法论

的路子，写了一篇《建筑创作的“重理”和“偏情”》；吸收接受美学的理论，写了一篇《建筑意象与建筑意境》；运用信息论美学的理念，写了一篇《建筑与文学的焊接》，等等。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建筑理论的新读解方面，我正处于纷杂的多领域触碰、多向度探试中。

在这些探索文章中，我自己比较喜欢《建筑的模糊性》这篇文章。因为我相信建筑的模糊性问题是个体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大约是1985年，我领着学生在沈阳进行古建筑测绘实习。突然有一天，在测绘现场遇见一位东北设计院的老总，我跟他不熟悉，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见到我就告诉我一个信息，说他前不久去《建筑学报》开编委会，会上研究学报这两年的工作，大家都说《建筑的模糊性》是这两年学报发表的最好的文章。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评。这个信息没有验证过，应该是真的。能够得到《建筑学报》编委这样的评价，我也很受鼓舞。我后来一直关注建筑的模糊性问题，关注建筑设计的黑箱思维，关注传统建筑的模糊空间、模糊手法。我曾经想围绕这个课题再作一个展开的、深入的探讨，但是因为研究方向的转移，一直没有做，我觉得欠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我写的这些理论性文章，都是直接发表于《建筑学报》《建筑师》等刊物，只有《系统建筑观初探》一文，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1985年2月，建设部设计司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召开的“繁荣建筑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个很小型的会，由设计司司长兼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龚德顺老总主持。座谈会主要围绕着建筑理论、设计思想、创作方向探讨如何繁荣建筑创作。这时候我刚刚写完《系统建筑观初探》一文，正好与座谈会主题十分对口，我就把这篇文章带到会上发言。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发言之后，竟然出了三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第一件是我刚发完言，主持会议的龚局长就向我要发言稿，他说他要带回家看看，明天就还给我。我没想到龚局长会这么关注这个发言，竟然

要看看我的发言稿，很有些受宠若惊。第二件事是在发言后不久，《建筑学报》的一位编辑就来找我，让我会后把发言稿整理成文，学报准备刊登。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首选的就是想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第三件事是在《建筑学报》编辑找我之后，《新建筑》的陶德坚主编也来向我要这篇文稿。我只好抱歉地说，被《建筑学报》编辑先要了。《建筑学报》1985年第4期，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29人发言摘要，并选刊了两篇会上发言的全文，其中第一篇就是我的《系统建筑观初探》。这几件事让我很有些激动，觉得这篇文章虽然磨蹭了一年多时间，能够这样地得到关注，还是很值得的，这给了我写建筑理论文章很大的鼓舞。

2009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侗、王明贤、张向炜撰写的《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纵览》一书。书中评介了中国建筑界60年的15位建筑理论家。我意外地发现，这个名单里居然有我。我注意到名单里有好多位都是外建史学科的大人物。正如邹德侗先生说的，他们对现代、当代建筑，对西方现代建筑思潮，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有很高的造诣。这个名单里来自中建史学科的只有我一人，我自己知道，对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的认知恰恰是我的短板，我是借助于方法论的视角，“跨界”进到建筑理论圈的，毕竟隔了一行，实质上只能说是个“票友”。因此早在2003年我退休时，我已打定主意，从建筑理论圈撤出，专心于我的中国建筑史学领域的“软分析、软探讨”。

没想到刚过一年就出了一个新情况，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建筑学院联合创办了《城市建筑》刊物。这是我退休前期盼已久的事情。《城市建筑》编辑约我为创刊号写一篇理论文章，这是我不能推辞的，我也不好写一篇建筑史学论文去充数。我不得不再写一篇建筑理论文章。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动脑筋，勉强选了一个自认为还比较醒目的标题，写了一篇《“建筑文明”与“建筑文化”》去应对。这篇文章有些难写，因为“文明”和“文

化”这两个术语自身的内涵和外延都还没有确定，仅“文化”的定义就有200个。我是看过《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发表的陈炎《“文明”与“文化”》一文，非常赞同他对文明、文化的界定，借助他的界定，才敢来考察“建筑文明”“建筑文化”及其关联性。我叙述了“建筑文明的内在价值和建筑文化的外在形式”，叙述了“建筑的文明尺度和建筑的文化品位”；分析了“建筑文明的价值转换和建筑文化的历史积淀”，分析了“建筑的文明散布和建筑的文化增熵”，最后提出了应对建筑文化增熵的三种“负熵流”。

这应该算是我写“建筑理论读解”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在这之后，我与这个领域的写作就“拜拜”了。

### 三、中建史讲稿

我讲《中国建筑史》，从1956年开讲，到2001年终止，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说起来也算是够漫长的。总的来说，我的讲课是比较顺利的。初期没有教材，参考书也很欠缺，我靠的是自己的听课积累。

我旁听过梁思成先生为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北京建筑师讲的中建史大课，听过莫宗江先生超长学时的中建史讲课，听过赵正之先生的《中国营造学》，听过北大侯仁之先生在清华讲的《北京城市史》，还有张之凡老师给我留下的别具特点的《建筑史与造型》讲稿。随着“中国建筑美学”科研的进展，我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也点点滴滴地同步融合进讲课中。这样的讲课还很受学生欢迎。

1987年11月召开全国“第二届建筑教育思想讨论会”，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不得不对中建史的教学理念作一番思索，当时围绕中建史的现状和教学要求，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学生的这种知识结构不满足于了解历史的建筑，而要求认识建筑的历史；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的表象、特征，而要求认识建筑文脉的内涵、实质；不满足于了解历史建筑的演进过程，而要求认识建

筑体系发展的本质规律；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的多彩风貌，而要求认识传统的建筑理念和符号机制；不满足于了解一个个具体的建筑实例，而要求认识它们抽象的概括模式；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是什么样子，而要求认识它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形态，要求认识制约它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环境结构、科学技术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背景及其制约机制；不满足于微观地、孤立地评价中国建筑遗产，而要求把中国建筑体系放在中国社会大系统中，放在世界建筑历史的广阔背景上，进行宏观的比较考察；不满足于中国建筑史的学习中，仅仅获得建筑历史的知识和素养，而要求获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收益，建立鉴往知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我当时对这段表述还很满意，在1994年召开的建筑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年会上，我还重述了这段话。一直到我退休后，撰写《寻觅建筑之道》这本口述史时，我才发现这样地表述仍然是空泛的。实际上我在中建史教学中，从不自觉到自觉，也曾逐渐形成两条自己意识到的教学理念，自我感觉这两条理念对中建史教学是很重要的。

我的第一条理念，是意识到建筑史的学习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未曾明确的作用，那就是“有助于培养建筑创作的‘黑箱型思维’”。

建筑创作的设计构思很大程度上带有黑箱型思维的性质。而黑箱型思维是隐埋的，建筑创作的历史实践经验不能凝结成“公式”，不存在“设计公式”；不能通过“构思规范”“创作定律”来传承和积淀。也就是说，前人的构思设计的“黑箱”是封闭的、打不开的。不过，黑箱虽然打不开，还是有出路的，那就是通过“黑箱方法”来包抄、逼近。所谓“黑箱方法”，就是不打开系统自身，而从系统的整体联系出发，通过对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进行整体研究，从而“逼近”对黑箱的认知。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建筑史的学习派上了大用场。因为历史建筑作品就是历代建筑师黑箱思维成果的“信息输出”；

而产生历史建筑作品的社会背景、地域背景、环境背景的种种“需求”和“制约”，就是那个时代建筑师黑箱思维的“信息输入”。我们打不开隐埋的“黑箱”，但可以考察它的整体输入和整体输出。建筑史讲的正是整体“输入端”的这样那样的社会、地域、环境背景和整体“输出端”的这样那样的建筑作品信息、建筑作品分析。因此，建筑史的教学是一个有效地认知建筑黑箱型思维、提高建筑创作修养、领悟建筑创作规律的学习过程，这正是建筑史课程学习最值得关注的一环。

我教了很多年中建史，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中建史讲课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纷纷跟我反映，他们都爱听中建史讲课的一些思想分析、手法分析，好像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建筑创作“悟性”的启迪，这使我意识到讲课中的建筑分析对建筑创作所需的“悟性”培养，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我并不明白。直到我认知什么是“黑箱型思维”，什么是“黑箱方法”，才恍然大悟，原来建筑史讲课，既分析黑箱的“输出端”（历史建筑的作品），也分析黑箱的“输入端”（建筑背景、建筑需求和制约条件），这正是从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逼近”对黑箱认知的“黑箱方法”。由此对建筑史学习“有助于培养建筑创作的‘黑箱型思维’”的理念，才有了自觉的认识。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搞文学的、搞艺术的要强调学习文学史、艺术史，为什么建筑学专业远比工民建专业对建筑史的学习要求要高得多，原来都是因为“黑箱型思维”的缘故。我觉得我们对于建筑史课程的学习意义，应该提到这个高度才能算是认识到位。

我形成的第二条理念是，建筑传统不应该停留于“硬传统”的认知，还应该深化到“软传统”的追索。

大约在1988年，我在“中国建筑美学”的研究课题中，提出了区分建筑的“硬传统”和“软传统”的基本论点，阐释了“建筑硬传统”和“建筑软传统”的概念：建筑“硬传统”是建筑传统的物态

化存在，是凝结在建筑载体上，通过建筑载体显现出来的建筑遗产的具体形态和形式特征；它是建筑遗产的“硬件”集合，是建筑传统的表层结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建筑“软传统”是建筑遗产的非物态化存在，它飘离在建筑载体之外，隐藏在建筑传统形式的背后；它是建筑遗产的“软件”集合，是透过建筑硬件遗产所反映的传统建筑观念、建筑思想、创作方法、构成机制、设计手法等；它是建筑传统的深层结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当我形成这个认识后，自然把这个理念渗透到我的中建史教学中，尽量把讲课内容引申到“软传统”的层面，注意讲一些能够上升到设计手法、创作思想、生成机制、构成法则、发展规律、价值观念的“软”的东西。我意识到把中建史教学深化到“软传统”的追索，对于中建史教学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理念都直接关联着中建史教学的“史学方法”。史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描述性史学”，另一种是“阐释性史学”。任何写史、讲史都蕴含着不同历史学者这样那样的描述和阐释。描述性史学遵循的是“传统的审视”，主要致力于建筑史实的考释和建筑发展历程的梳理，客观地描述历史上的建筑活动和建筑特点。而阐释性史学遵循的是“现代的阐释”，是以“现代视界”，从历史文本中，读解出新的意义。这种以现代的意识、广阔的视野来辨析建筑传统中正面的、负面的东西，发掘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意味着对建筑史料、建筑史实信息价值的再开发，具备着“点石成金”的价值转化功能。显然，描述性史学主要关注的是建筑的硬传统，而阐释性史学则深入到建筑“软传统”的层面。

从培养“黑箱型思维”的角度，我当然也意识到，阐释性史学比描述性史学更能起到作用。但是当我认知到建筑史教学有助于培养建筑创作的“黑箱型思维”时，我已经退休、离开讲坛了。“阐释性”并非能够一蹴而就的。我的讲课，并没有为《中国建筑史》讲稿搭构出“阐释性史学”的框架，只是把自己意识到的、能够提升到“软”的层面的东西，星星点点地粘贴进去，在从“描述性”转向“阐释性”的努力中，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我的讲课还存在一个大问题：没有写出相对应的讲稿。每次讲课，我都根据科研的推进，添

加、变动、微调一些讲的内容。这样，原本活页的讲稿就被搅得很乱。再加上我写讲稿没有像写论文那样在文字上、用词概念上认真地推敲，因此我的讲稿是零乱的、很不严密的。我没有想到有不少学生很认真地做听课笔记，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中建史听课笔记。这些不同的听课笔记在学生中，特别是考研学生中流传。我曾经看过几本这样的“听课笔记”，都混杂有这样那样的听课记录差误。这让我大吃一惊，深恐误以为是我的原意，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当我写完《寻觅建筑之道》这本口述史后，曾想过对我的中建史讲稿作一下整理。但是这个工程太大，我请刘大平、刘洋两位继任的主讲帮我一起写，他们也热情地同意参与。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老讲稿即使作了清理、订正，也是20年前的东西，不值得做了。而且我在一场心力衰竭的住院之后，整个人身体塌了下来，已经无力进行这样的清理了。

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建史讲稿，我最感到遗憾的，就是在我形成了“有助黑箱型设计思维”和“应该上升到‘软传统’深度”的教学理念之后，我已经退休、走下讲台，并没有编写出与这两个理念相对应的教材。

#### 四、中国近代建筑

我头些年参加的建筑学术活动，接触的都是中国近代建筑。

第一次是参加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的编写“建筑三史”。我被分配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编写组”，参编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

第二次是参加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建筑简史》，我参加的是《简史》的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此书于1962年10月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首次正式出版。在此书编后记中提到，“本书最后由侯幼彬、王世仁、范国骏作了全书文字的整理及个别部分的修正补充”。

第三次是建筑工程部委托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建筑史》教材。我成了刘先生挑选的3名助手之一，刘先生安排我撰写教材的第二篇——“中国近代建筑”。

第四次是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

林、城市规划》卷（简称《建筑》卷）。我撰写的是“中国近代建筑”主条目。

第五次是参加汪坦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我担任《总览》中《哈尔滨篇》的分册主编。

第六次是参加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教材编写，这是高等学校统编的教学参考书。我参与的是教材第二篇“中国近代建筑”，1~3版由乐卫忠先生与我两人合写，从第4版开始，到现在发行的第7版“‘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第二篇由我一人撰写。

第七次是撰写“中国建筑名师丛书”之《虞炳烈》，由我和老伴李婉贞合写。

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写史的“专业户”。但是，我却一直觉得这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我的自我感觉，好像我只是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票友”，一次次地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平台上“客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在我参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编写过程中，有过哪些经历，有过哪些难忘的幸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口述史《寻觅建筑之道》<sup>[2]</sup>一书和《缘分——我与中国近代建筑》<sup>[3]</sup>一文里，都有详细的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潘谷西先生在《一隅之耕》中，针对编写教材，说了一段他的感受：

“编写教材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仅能收录已有成熟科研成果，而不能表现自己独到学术见解的工作，甚至有人称之为‘剪刀加糨糊的活儿’，所以并非人人都乐意承担此项任务。”

这的确是我们这些参加编写教材的人当时的共同感受。我们是“编”，不是“著”。教材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有些像“大百科全书”，所写的知识是“标准”的知识，应是成熟的、普遍认同的，这样就难免停留于汇聚前人的成果。我参编《中国建筑史》教材的近代部分，就有这个苦恼。一直到第4版，教材上升为“国家级‘九五’重点教材”，需要作较大的修订，我想这次一定得有一个脱胎换骨的突破性

蜕变，应该全力找到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本质、发展主题，应该对中国近代建筑教材的整体构架、整体理念有一个全盘刷新的建构。

这时候，中国近代建筑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已在全国蓬勃地展开。与近代建筑相关的现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城市研究、口岸研究、租界研究、房地产研究等都有专著问世。我尽可能地翻阅这些文献，从这些著作和文献中得到了很大启迪。给我最大震撼的，是美国现代化学者布莱克的一段话。他在《现代化的活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大转变是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大转变是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大转变则是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这个第三次大转变指的就是以近代化为起点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转型’”。这个“现代转型”居然被提到与人类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并列的高度，可见这个转变的意义之重大。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建筑，首先应该把它摆到这个历史大背景的高度来考察。意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一直苦苦寻觅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基本发展线索，这下子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居然在这里觅到了。

由此，我明白了“现代化”是涵括“近代化”在内的。所谓“近代化”，实际上是在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是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近代化的进程，就是现代转型的初级进程，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转型”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基本线索，视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线、发展主题。

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我知道可以试探着以“现代转型”这根主线来建构“中国近代建筑”新的理论框架。

我侧重思索了中国近代的的城市转型、建筑转型，思索了现代转型的两种途径，

思索了乡土建筑的推迟转型。受到赖德霖博士学位论文的启发，我在建筑转型中，从过去只关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队伍、建筑风貌，而补上了建筑制度，从建筑生产关系的层面阐发了近代建筑的发展机制。

对于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转型内涵，我在思索了这个主要梗概后就止步不前了，因为我的研究方向主要转向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软”思索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我写有关“中国近代建筑”领域的论文，对我不是很对口。因为我早期参与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是参编《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那个时期，整个中国近代建筑研究领域还处于很低下的水平，我自己也刚刚接触中国近代建筑，谈不上什么研究思路，却连续地承担重要的编写项目。这既约制了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水平，也难免分散了我研究中国建筑“软”思索的时间。我以为，从编写“建筑三史”，我被分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编写组”开始，我就迈错了门。其实非也。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参与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对于我的学术成长和我的整体学术活动，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如果我最初进入的不是近代建筑组，就不可能参与随后的《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的编写。如果没有最后坚持到《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的正式出版，建筑工程部委托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建筑史》通用教材挑选3名编写助手时，也不可能挑选我来担任近代建筑的编写助手。而有幸被刘敦桢先生挑中，加入到刘先生主编教材的班子，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在编写教材的两年中，特别是最后在刘先生身边集中修稿、定稿的4个多月，刘先生每天都在不停地思索，不停地跟我们讲说。这时候的刘先生应该说是站在中国建筑史学科的顶峰，他把自己顶尖级的学术见解和最新思索，都一股脑地端给我们。刘先生讲的、思索的虽然多属古代建筑范畴，但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心真正关切的正是整个中国建筑体系。

我的整个感觉是，刘先生牵着我们这些学人稚嫩的手，不仅带我们“登堂”，而且领我们“入室”，尽力让我们触及中建史学科的深层，我的自我感觉是迈进了对我的史学成长至关重要的一步。我想，也正是因为曾经有过在刘敦桢先生主编的教材编写组当近代建筑编写助手的经历，潘谷西先生在搭构“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编写班子时，才邀请我参与中国近代建筑的编写。应该说，我的这一连串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工作，对我的整体学术活动，还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 五、建筑小品和普及读物

我的初中上的是南京市立五中。学校跟前有一些敞着门脸的“租书屋”，我几乎不间断地包月租书，什么书都看，整个初中时期，杂七杂八地泛读了不少书。初中毕业，我爸的工作调动到浙赣铁路局杭州电务段，我也迁居到杭州。在杭州，我曾报考过当时很热门的“杭州高级中学”，没有考取，失学在家。我爸工作的电务段在杭州“里西湖”，这里有一座小小的、很幽静的铁路图书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图书馆。它的面积不大，藏书不多，但已足够我看的。我可以在这里看各种杂志、各种画报，也可以借书回家看。我迷上了看文学选集，一本本地看《鲁迅选集》《巴金选集》《茅盾选集》《沈从文选集》……我记得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是在这里看的。我现在回顾，这段时间大数量地、密集地读书，是大有裨益的“阅读”，虽然失学，却让我转化成了读书少年。我从这时候开始了少年习作。我的处女作《玲玲》在杭州《大华日报》的副刊《龙门阵》发表后，就更来劲了。后来我迁居福建莆田的一个小镇涵江，就给镇上很小很小的《闽中日报》投稿，也鼓足勇气给我当时心目中本地区的大报——厦门的《星光日报》副刊《星星》投稿。这些习作都顺利地发表了。在上高中前的这段日子，我这个不幸的失学少年，有幸地经历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少年期文学习作，成

了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回忆，也为后来从事建筑史论研究的我，积淀了一些写作的潜能。

20世纪50年代“美学热”这段时间，报刊上的知识小品也很热火，这自然大大地吸引了我。有一位笔名叫“易水”的作者写了《针》《黑陶杯》《古代彩陶》《椅子溯源》等许多短文，这启发了我，觉得中国建筑遗产也有很多选题值得写。知识小品要求写得短小精悍，把精髓的科学知识与生动的散文笔法相结合，既深入浅出，也趣味盎然。我觉得这很适合我，就很热衷地尝试。我选了第一个题目，用1200字的篇幅写了一篇《窗》，投给了《人民日报》副刊。我没想到，没过多久，就收到副刊姜德明编辑的来信。他说《窗》稿拟用，并鼓励我继续写桥、亭、廊、门、塔等一系列建筑小品。这封信大大鼓舞了我，当天晚上我兴奋得难以入眠，脑海里一直回旋着下一篇写什么？我闪过一个念头，写“塔”，可以颂扬塔的“品质”。我觉得在塔的身上，蕴涵着很多值得颂扬的“品质”：可以写它的高龄长寿；可以写它的高崇向上；可以写它的一层层登高眺远；可以写它的螺旋式梯级上升。可以塔与山的关系暗写党群关系：塔有了山，就有了根基、有了依托、有了屏障；山有了塔，就有了重心、有了神采、有了指向。可以写塔的坚实品质，每一条灰缝都踏踏实实，每一个榫头都严严实实。我按着这样的构思，充满激情地用1100字写了一篇“塔”的颂歌。写完了才发现，我写走样了，这根本不像标准的“知识小品”，而像是塔的抒情散文。我舍不得抛掉重写，就这样寄给《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日报》副刊也给我刊登了，我很高兴。我接着就按姜德明编辑点的题，继续写了《门》《廊》《天花板》《栏杆》。这时候，我惊喜地发现，《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了梁思成先生写的《拙匠随笔》，从1962年4月至9月，连续发表了梁先生的《建筑（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从“燕用”——

不祥的谶语说起》《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索》五文。像梁思成先生这样的大人物也写知识小品，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带劲。这段时间我真是迷上知识小品的写作，还写了另一组小品投给省报副刊。没有想到，好景不长，随着政治“风向”的转移，各报副刊已经不大用“知识小品”文稿了，我的“建筑小品”写作，也就这样戛然而中止了。一直到1997年，台湾地区创办《dialogue 建筑》双语刊物，总编辑郭肇立先生约我写稿，又燃起了我写建筑小品的热情。在这本漂亮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组与我久违的建筑小品。

我写的“建筑小品”，加在一起篇数也很少，我的“小品梦”可以遗憾地说没有圆成。不过“小品梦”虽然没圆成，却意外地得到了编写中建史普及读物的机会。

大约是200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张建编辑约我写一本《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我觉得她的这个组稿创意很好。建筑学专业的《外国建筑史》课程，早在1978年，就有同济大学建筑系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合编的《外国建筑史图集》。罗小未、刘先觉等几位名家都曾投入这项工作。那本图集很受学生欢迎，起到很大作用。《中国建筑史》课程还欠缺类似的参考书，的确很有必要编写。

赶巧在这之前，我的女儿、女婿把他俩淘汰下来的“386”计算机搬到我家，我和老伴正津津有味地学电脑。正当这个兴头上，突然遇上了写“图说”的事，我们觉得正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图说》的写作、编排，来学习计算机的运用。

这件事老伴李婉贞的兴致比我还高，她自告奋勇可以干“图”和“录”的事。我们添置了扫描仪和打印机，有关找图、选图、画图、扫描图、修饰图、打印、编排这些事，她都饶有兴趣地干。

我们琢磨这本书该怎么写，大体上形成了几点想法：

- 一是图文并重；
- 二是简练精要；



三是采用以“断代”为框架的列词条写作体例；

四是凸显各个历史时期木构架建筑体系的演进特点；

五是对民居建筑的恰当处理。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当然要纳入古代民居建筑。但是，现存的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居宅屋实例，绝大部分都是近代所建的。如何能够把建于近代时期的民居建筑实例，归入到古代建筑的图说之中，成了一个难题。我想了一招，把这一章以“传统的延续：近代乡土建筑”为标题，这样就把传统民居名正言顺地展述了。

六是在简约的表述中，力求达到有深度的论析。全书篇幅为“384千字”，图面占去版面的60%以上，全书文字实际上还不到15万字。这个字数应该说是很少。因此，文字表述必须简约，只好大刀阔斧地省略历史背景、社会背景的描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概说”，也精简到只用几百字来概括。为了能达到一定学术深度，重点条目还是安排了尽可能充实的篇幅。现在回过头来看，通过这样的处理来保证重点篇幅，对于深化分析还是很起作用的。如“北京四合院”条目，由于占用2页版面，可以有1500字来展述。因此，在叙述了北京四合院单体、组群、构成、形制、间口、门式之后，还能表述它所呈现的以空间等级区分人群等级，以建筑秩序展示伦理秩序；展述它的伦理教化功能与安居适用功能的合拍，礼的规范形制与木构架体系的艺术表现规律的吻合；揭示它所体现的官工正统与京畿地域性的双重本质。我想通过这种“点睛”式的“软”分析，来尽量充实《图说》的学术内涵。由于版面也是我们自己用土办法编排的，也尽量体现版面规整大方、紧凑充实、信息浓缩密集的预期意图。

《图说》出版时，我也退休了，和老伴一起定居到北京了。听说确有建筑院校把这本书作为中建史的参考书，也听说这本书在考研的学生中受到欢迎。渐渐地，这本《图说》好像成了畅销书，到2015年7月，它已经进行第23次印刷，出版总数达到5.6万册；到2024年1月，已达37次印刷，出版总数105289册。建筑类的参考书，出版能够超过10万册，应该说是罕见的。当在网上网购这本《图说》的情景很有点热闹，有几千读者写了评语。从评语知道，读者中有很多是老师推荐他们买的，或是同学间相互通告的。买

这本书的很多人都是为了考研。最有趣的是，有一位读者把这本书称为“考研神器”。

这本《图说》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意外是，它竟然入选了“首荐”。什么是“首荐”？它的全名是：“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这是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开展的一次遴选，全国有312家出版社报送图书1072种参选，于2015年12月28日确定首批推荐图书86种。完全没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居然在这“首荐”之列，建筑领域只入选了这一本。当我们俩得知这个信息时，的确有喜出望外的感觉。我查看了86本的“首荐”图书名单，这里面有：蔡元培的《中国人的教养》、费孝通的《中国文化的重建》、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吴小如的《吴小如讲杜诗》、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夏承焘的《金元明清词选》、叶嘉莹的《人间词话七讲》、俞平伯的《唐诗鉴赏辞典》、李学勤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任继愈的《老子绎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这些人都是我心目中最权威的大师、名家，这让我对“首荐”的分量刮目相看。对于能够意外入选“首荐”，令我有一种分外的高兴。我觉得这好像对我退休前的写作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句号。

#### 注释

① 我一直没有去追索梁先生指的这位学建筑的博士是谁，一直到2018年，台湾的郭肇力先生来到我家，我们聊到这事，我才从郭先生这里知道，这位博士是张一调。他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 *THE TAO OF ARCHITECTURE*，中译名正是《建筑之道》。此书在1956年就取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版权。郭先生特地在台湾买了一本1981年版的 *THE TAO OF ARCHITECTURE* 送我。知道“张一调”名字后，我也查看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吕祖谦先生的中译文。张一调的学位论文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一是“建筑视觉中的自然生命运动”；二是“变化和补充”；三是“均衡与平衡”；四是“个体与整体”。

#### 参考文献

- [1] 侯幼彬. 研究随笔二——外行写的三则“老学”小文[J]. 建筑师, 2022(4): 46-47.
- [2] 侯幼彬著, 李婉贞整理. 寻觅建筑之道[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3] 侯幼彬. 缘分——我与中国近代建筑[J]. 建筑师, 2017(5): 8-15.